

阐释艺术的创新和挑战： 申丹《短篇叙事小说的文体与修辞： 显性情节后面的隐性进程》*

〔美国〕H·波特·阿博特
惠海峰译

内容提要：申丹的新杰作《短篇叙事小说的文体与修辞：显性情节后面的隐性进程》从四个方面超出了其采用的形式主义和修辞学派的方法，提供了阐释叙事作品的一种新的框架，使我们得以挖掘情节后面的另一种叙事运动，看到作品更加复杂深刻和更为广阔的意义世界。与此同时，本书对现有批评方法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给叙事理论带来了新的活力，提出了许多很好的问题，给我们带来诸多启发。

关键词：申丹 《短篇叙事小说的文体与修辞》 阐释艺术 创新 挑战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5)01-0152-05

DOI:10.16430/j.cnki.fl.2015.01.023

[Shen, Dan.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Overt Plot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4.]

阐释艺术一直以来乃至今后都是一门由专家揭示未曾发现的意义的艺术。这包括那些20世纪的阐释家，他们常常精于发现被读者忽视、甚至作者本人也忽视了的意义。有时批评家未能关注读者阅读文本的过程，这时他们自己也会错过一些意义，而20世纪一些专家正是精于发现这些连批评家也错过了的意义（借鉴了认知主义文化和文学研究的方法如今风头正盛）。还

有时，我们忘记了文学文本是精通某种技巧的专家的产物，因此阅读跟创作一样都需要训练有素。一些文学研究方法关注的正是这种情况下我们错过的意义，这就包括经常遭到反对的形式主义和新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派。申丹将这两种方法很好地融入了她研究叙事艺术的新杰作《短篇叙事小说的文体与修辞：显性情节后面的隐性进程》(*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 这篇书评原载美国学术期刊《文体》(*Style*)，参见 H. Porter Abbott, "Review: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Overt Plots," *Style* 47.4 (Winter, 2013): 560-65. 感谢《文体》期刊主编授权发表中译文。

Fiction: 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Overt Plots)中。该书是21世纪叙事理论的一个闪耀的典范,它坚持将阐释艺术和小说创作艺术以一种极具说服力的方式全面结合在一起。它体现的依然是揭示性的艺术,但它揭示的意义之所以被读者错过,不是因为意义过于隐蔽,而主要是因为读者的阐释框架不允许他们发现其实就在眼前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申丹超越了她所采用的形式主义和修辞学派的方法。我认为,她的超越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读者(以及批评家和文论家)在阅读叙事小说时,被叙述出来的事件之先后顺序以及事件表达意义的不同方式(放大、重复等等)——即情节安排——所羁绊。情节是叙事的力量之所在,是主导性的进程,是叙事性的首要来源;换句话说,情节就是当我们觉得在读“一个好故事”时所记录下来的东西。正如申丹所说,阐释者对情节及其发展结果的聚焦和强调可以回溯至亚里士多德。然而,当我们被“显性情节进程”过度吸引时,我们会错过一些东西,这包括申丹在一系列重要例子中所定义的叙事的“隐性进程”。

隐性进程的存在是该书的第二个主要论点,申丹通过对六个短篇小说的解读对此进行了论证。其中三篇是美国作品(出自爱伦·坡、史蒂芬·克莱恩和凯特·肖邦之手),另外三篇是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的作品。作为意义的源头之一,叙事的隐性进程可以与情节走向大相径庭,在有些例子里甚至颠覆文本看似显而易见的意义。因此,尽管肖邦深受好评并经常被讲授的小说《黛西蕾的婴孩》的情节进程传递了对种族主义者之伪善的控诉,故事之下却始终存在着一个

隐性进程,它支持一种基于种族主义的区分:白人具有天生的美德,而黑人天生具有邪恶的倾向,即便是微薄的血脉也可能遗传这种邪恶。但隐性进程也并不一定颠覆情节进程的道德寓意。正如申丹在她精心选择的文本中所表明的,隐性进程(有的作品则是多重隐性进程)能够以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来改变我们对故事的意义世界的理解。

例如,在克莱恩的《一个战争片段》中,有一条隐性进程揭示了士兵们被孩童化的方式,另一条隐性进程则揭示了生活在更大冲突阴影之下的士兵们如何被渺小的个人矛盾冲突所左右。通过追寻这些隐性进程,读者能更加全面、更为精确地理解小说,明白“战争的毫无意义和被浪漫化的英雄主义的虚幻性”。(69)曼斯菲尔德的《唱歌课》看似对情绪不稳定的音乐教师作了尖刻讽刺,实际上却包含同情女主人公、表达更加重要的意义的一股潜流。音乐教师的地位和自尊心完全依赖于她能否在还嫁得出去的时候给自己找个丈夫。梅多思小姐的确是可悲的,她的行为完全取决于她的未婚夫是否会毁掉他们的婚约,这又极端到了可笑的地步。但申丹在曼斯菲尔德的语言中发现了隐性进程,它让我们逐渐看到从出生就束缚了音乐教师的男性主导文化的铁笼。这里的曼斯菲尔德是严厉的社会批评家、道德家,却经常被误认为是美学家。其他评论家有时带有先见地在文本中寻找他们想看到的东西,而申丹却能通过文本细读发现一个不一样的曼斯菲尔德。D. H. 劳伦斯就对曼氏的社会批评视而不见,在一封给她丈夫的信中居高临下地提到:“可怜的凯瑟琳,她是那么精致,那么感人。——却不伟大!”(123)

申丹的这种阐释方法大体上是文体学分析,对文体分析的强调构成了本书的第三个主要论点。她主张,为了理解这些小说的修辞,为了全面把握小说宽广而复杂的道德含义,读者需要训练有素来抓住对情节似乎无关紧要的词语、意象、动作、暗喻、短语,还有转瞬即逝的想法。没有了这些细节,小说也许仍然有同样的驱动力,同样强烈的叙事性,但却没有了在叙事过程中逐渐显现的更为广阔的意义世界。宽泛地说,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是罗曼·雅各布森(1958/1960)所说的“诗歌的语言”,那是属于语言学的黑暗大陆,但更完整地说这正是文学的文学性之所在。现实主义小说可能看似(或假装)缺乏文学性。与此相反,一些现代主义小说家刻意在小说中使用大量诗歌手法来展示其文学性。随后,新批评学者将诗歌分析的技巧带进了小说研究,他们可算是早期文体学家中最旗帜鲜明的一派。

许多新批评学者在长篇和短篇小说中发现了文学形式的诗性“空间化”;与此相对照,申丹采用了“进程”(progression)作为术语,并用“流”(current)这一暗喻来加以支撑。以进程为中心是叙事学和文体学的结合之处。对事件的先后安排(尤其是因果关系)使情节进程对于读者具有明显的影响力,虽然“隐性进程”没有这样显而易见的影响力,但它同样也是一个叙事的进程,具有自身前进的方向,会影响读者,正如反向的逆流会影响游泳者一样。在这里我有些夸大了。申丹并未使用“逆流”(undertow)一词,她也并不认为理想读者有溺死的危险。但这本专著中随处可见“潜流”(undercurrent)一词,而且还用了其他伴生术语,例如“深”(deep)、“深度”

(depth)、“更深一层的意义”。情节犹如河水的主流,我们随着情节走,难以感受水下的潜流,正因为如此,申丹使用了这些指示性的、关于深度的、表示位置的暗喻性术语。本书致力于帮助我们看到和感受到作品里其他的叙事进程,那些当我们被情节这一主流带着往前走时会忽略的其他的叙事运动。

当然,有很多受过良好训练的学者已经对文本进行了阐释,申丹可以借用他们的阐释来衬托出她采用自己的方法所揭示出来的意义,这是前人哪怕是在非常仔细地阅读文本时也忽略了的意义。实际上,阅读本书的乐趣之一正是看申丹如何将所有支撑她的创新性解读的各种细节逐步揭示出来,这一过程有序、深入、一丝不苟。但申丹的方法绝不只是对文本细节的洞察秋毫,我认为该书的第四大观点涉及文体分析的完整性:只有不遗余力地从文本之外寻求所有相关的证据才算完整,这涉及历史、文化语境和作者经历,以及互文关联。如果不关注这些语境因素,就无法发现爱伦·坡的《泄密的心》的隐性进程,以及人物—叙述者独白中可靠性与不可靠性的复杂关系。若要完整理解该文本复杂丰富的意义,就必需了解坡的短篇小说美学的道德层面,了解他在不同小说中对疯癫的各种表现方法,最重要的是要了解19世纪关于疯癫的性质和法律地位的争论。

但回到书中持续不断出现的关于深度的术语,我不禁要想它们是否带有某种特殊的意义,需要元阐释的文体学知识方能理解。“深”这个词是否还有更深的意义?是否“下面”(under)一词之下还有洞天?这个前缀 under 是受了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对古希腊悲剧的抒情性

片段中“显性思想”(overt thought)和“潜藏思想”(underthought)区分的启示：显性思想是清楚的，无可置疑的；潜藏思想则隐藏在诗人比喻性的语言中。申丹的专著以霍普金斯的区分开篇，但把“潜藏思想”一词改成了“潜流”，并将她的暗喻与费伦(James Phelan)视为修辞性叙事学之中心的进程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如上所述)。但是一旦曾位于深层的东西被置于眼前，它还算是“深层”的吗？潜流一旦被发现，我们能够观察它，并借此感受到它对我们的影响，它还算是“潜流”吗？假设我们都转做文体学细读，从情节对我们的掌控中摆脱出来，像我们应该做的那样进行整体细读，将文本的所有意义一览无余，那时我们还会讨论“深度”吗？当然，“深度”一词常被作为暗喻来表示象征意义，这种意义被压缩进我们在表层所观察到的东西之中，正如王尔德在《道连·葛雷的画像》序言中所写的：“所有艺术同时既是表面又是象征。”但申丹的方法显然不是解读这种象征意义：“我关注的主要是与情节同步发展的非象征性的隐性文本运动。”(10)

我不能为申丹代言，但“深度”及其伴生比喻对我来说仍十分有用，因为她出色的研究不仅挖掘出许多深层次的东西，还增加了我们在阅读过程中所感受的复杂性——这是只有在阅读时才能感受到的，这些都是处于表层之下的东西。即便这听起来隐约像新批评，但对于书中所分析的意义浓稠复杂的有些作品来说，阐释工作实际永远不可能让我们到达某个可以一劳永逸的终点。恰恰相反，如果我们能够做得像申丹那样出色，阐释工作就能使我们再次阅读故事时仍然被它们的魔力所折服。例如，在解读曼斯菲尔德的《启示》时，

申丹令人信服地指出，文中存在一种隐性进程。读者通常认为该故事是对一个扭捏作态、神经过敏的自恋狂的刻画，而隐性进程却揭示出对产生这种自恋狂的父权制上层建筑的控诉。申丹睿智地将故事中的莫妮卡·泰瑞与曼斯菲尔德的《序幕》中更加自觉的贝利尔以及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更加积极果断的诺拉做了对比。但她认为，由于《启示》中存在隐性进程，对受害者莫妮卡的同情也很强烈，因为隐性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在显性情节中存在的莫妮卡与隐含作者还有读者的叙事距离”。申丹对故事后面的一个意象做出了精妙的解读，认为莫妮卡是一个悲剧人物。要是我们认为莫妮卡是一个无助地生活在父权制社会控制下的有自我意志的人物，那么我觉得我们对她的恰当的感觉就不应是沉重的悲剧感，而会是怜悯。我猜想作者既没有这么觉得，也不想让我们有此想法。我认为故事的显性情节也在起作用，它使我们的反应更加复杂化：既有对代表性男性(愤怒的出租车司机、愚蠢的拉尔夫)的愤怒，也有对莫妮卡的同情，同时还有对失败的主人公的愤怒和失望。假如没有这一层愤怒，莫妮卡的形象就单薄了，缺少了采取行动的潜能，这是曼氏从自身经历中了解到的女性的潜能。

我认为“深”作为暗喻在像这样由故事唤起的情感/认知状态中尤为适用，这时看似完全矛盾的不同感觉和看法以某种方式共存。申丹可能与我在《启示》上有不同看法，实际上她的用词表明她的看法的确不同；但要不是她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这个故事中隐性进程如何起作用的话，我也不可能对故事产生我自己的深刻看法，将不同感觉似非而是地融合在一起。她对曼斯菲

尔德最受争议的《苍蝇》的非凡解读也是如此。申丹一步一步地积累,逐渐揭示出聚焦于中心人物(一个公司老板)之虚荣心的隐性进程,它与情节的主题形成反讽性的对比,后者与老板之子六年前死于一次大战有关。这里我再次从申丹的解读中受益颇多,虽然我不明白为何她认为对老板来说“儿子仅仅是继承他事业的工具,是在他活着乃至死后能给他带来荣耀的工具”。(133,强调为笔者所加)

无论本人对这些故事的解读会引起多少争议,重要的是,申丹为解读这些作品的每一个中心人物都令人信服地提供了另外一个阐释框架,使我们得以从新的角度对这些人物做出情感和心智上的回应,这可以跟其他大相径庭的阐释框架并存。在这个意义上,故事在“更深”的层次上施展着魔法,而通常认为更深的层次处于一个阐释框架的“内部”。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小说家们常常说他们无法谈论自己的作品。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继承了曼氏的伟大传统,她是位真正深刻的短篇小说家。她也这么像念咒一样说道:“我只是按照自己的感受把它写下来,就是这样。”(爱丽丝·门罗)^①如果阐释的确能揭开意义的面纱,而像申丹这样的批评家的批评家(a critic's critic)无疑可以做到这一点,那么它也能帮助我们在重读作品时感受到:在前人的批评语言中依然存在着一层面纱。申丹通过强有力的解读论证了强有力的观点。但正如其他最为出色的著作一样,她的阐释并不是终点,而是给阐释服务的对象——阅读过程——带来活力。

最后,本书还给叙事理论带来了新的活力。它提出了许多很好的问题。在更长的虚构形式(如长篇小说)中隐性进程是如

何展现的?它是否可以分为几类,正如我们通常认为情节可以分为不同种类一样?作为进程,它们是否变化发展?如果有多个隐性进程,它们是否可以相互颠覆?隐性进程是否主要存在于文学虚构作品中?如果阅读情节时我们也注意到了隐性进程,并在其指引下来颠覆情节,那么在我们的情感/认知的深处又会发生什么?总而言之,这不仅是一部重要专著,提出了独创性的论题,并通过一系列颇有分量的解读进行了精湛的阐发论证;而且本书还具有挑战性——最为出色的挑战性。□

作者单位: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

译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① See Alistair MacDonald, “Will Nobel Prize Winner Alice Munro Come Out of Retirement?” *WSJ*, Oct. 22, 2013.

Thing and Thing-in-Itself, an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desire's object and desire's cause, this essay aims to study the THING in the theory of Žižek.

ZOU Zan **Richard Hoggart and the Cultural Turn** 128

Richard Hoggart thoroughly understands the tremendous changes of post-war British social culture, prospectively brings contemporary culture into his research, and carefully analyzes the working class cultur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order to reveal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working class' daily life and individual experiences. Therefore, Hoggart transforms the opposition between the elite literary culture highlighted by the British "culture-civilization" tradition and the vulgar mass culture into an emphasis upon most people's daily life. Hoggart's cross-disciplinary view, including experience, agency, ethnography and textual close reading, puts culturalism as the main paradigm of early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NANGONG Meifang **The Biblical Metaphor in Toomer's Cane** 137

The rich biblical metaphor in Jean Toomer's most famous novel *Cane* is a common focus of the critics. The title *Cane* pronounces exactly the same as the biblical character Cain, and the novel itself has much reference, if not similarity, to Cain's story. Meanwhile, since Cain was often referred to as the ancestor of the Black people during slavery period in the south, the author's Black lineage and his identity as well as the Black culture in the south have inevitably become one of the frequently discussed topics in its study. But a closer study of this novel shows that Cain's story has been subtly adapted, and what the novel is concerned with is not just the identity and destiny of the Black, but the whole south, including both the Black and the White.

LIU Bin **Feminist Animal Ethics in Contemporary West** 144

Animal studies, now a very prominent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area, has inspired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animal ethics, of which contemporary feminist animal ethics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branch. Despite its diversity and plurality, contemporary feminist animal ethics share the following themes: firstly, animal enjoys moral significance; secondly, emotion is preferred over logic and reason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nimal ethics; thirdly, the symbiotic relation between speciesism and sexism; fourthly, the moral significance of vegetarianism. Apparently, feminist animal ethics has helped boost the awareness of animal rights and has broadened the horizon of feminist research. However, it has triggered many problems: will animal ethics, a newly-developed western Anglo-Saxon ethics, be seized by the west to justify its interference in other nation's culture? Doesn't vegetarianism mean that a kind of personal dietary preference will be imposed upon the public as a universal rule? Will women's identification with animals be essentialism? Doesn't it mean the construction of another binary opposition when feminists replace reason with emotion?

H. Porter Abbott **Innovation and Challenge in the Craft of Interpretation: Dan Shen's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Overt Plots** 152

Dan Shen's remarkable new study, *Style and Rhetoric of Short Narrative Fiction: Covert Progressions behind Overt Plots* forms a departure from the formalist and rhetorical roots of her approach in four principal arguments. It provides a new interpretive frame, enabling us to explore another narrative movement behind the plot development and thus to comprehend a larger world of meaning that is more complex and profound. Apart from being innovative, the book itself will invigorate narrative theory. It presents a forceful challenge to existing criticism, raising many good questions and being thought-provoking in various ways.